



文淵閣《四庫全書》「不全」說—— 續補、空函與遺失

■ 曾紀剛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文淵閣《四庫全書》，是清乾隆年間（1736-1795）率先竣工的第一部，也是唯一存放在紫禁城內的一部。長久以來，世人普遍認為此乃「惟一僅存完備精繕之四庫全書」；伴隨影印本化身千百以及學術界探蹟考求，堪稱家喻戶曉的故宮「重量級」文物，更在2017年經文化部指定公告為「國寶」。然而，無論從史料記載抑或文物自身透露出來的訊息，在在提醒我們：眼前這部大書，其實並不完整，也非原汁原味，甚至還有別藏海外的零星手足！適值新一季「院藏善本古籍選粹」例行展的推出，搭配相關單元選件並試撰小文，邀請讀者一起理解和面對文淵閣《四庫全書》的「不全」，從而思考古物流轉傳藏所導致的闕遺，究竟徒留蒼白嘆息？還是正好帶出新的收穫與想像？

「四庫云全畧未全」

根據乾隆朝「上諭檔」記載，第一分《四庫全書》於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1782年1月19日）正式「辦理完竣」，皇帝諭令議敘所有總校、分校人員，以示獎勵。翌年仲春，舉辦經筵典禮完畢，乾隆照常在文華殿後的文淵閣賜茶、賜宴予滿、漢講官以及侍班聽講諸臣。自從乾隆四十一年（1776）春文淵閣新建落成後，每年此時參與講筵暨宴會者，都還只是參觀樓閣巍煥的營構規制，行禮如儀；如今恰逢首部《四庫全書》繕校告成、裝潢盛函，奉藏文淵閣內103座楠木書架上，¹縹緗連楹，皇皇鉅觀，格外具有歡慶盛典的氛圍。正好當次擇定進講的內容，有一部分即是講授《論語》〈雍也〉篇「知者樂，仁者壽」旨義，乾隆皇帝有感而發，遂題詠「高閣雖云落成久，書成四庫慶斯真」這般詩句，以誌快慰欣喜之情。另有注語云：

文淵閣落成已久，而《四庫全書》第一部昨歲冬始得告成。今排列架上，古今美富，畢聚於此，實為慶幸云。²

儘管君臣上下一致宣稱三萬六千冊文淵閣《四庫全書》已經「完竣」、「告成」、「葺事」，但此刻書架上6,144個楸木書函並非全都裝滿，少數排定寫入「全書」的書籍，其實尚未完成編纂、繕錄、校對、裝潢等程序，如數製備的函匣也只能預先留空，虛位以待；皇帝對於這樣的情形，自是全盤掌握，也了然於心。乾隆四十七年（1782）仲春經筵後不久，軍機大臣即奉旨查核奏報武英殿、翰林院、方略館等處纂辦書籍進度與曾否寫入「全書」的具體情形，所列「纂辦全竣現在繕寫刊刻」一項就有《皇輿西域圖志》、《音韻述微》、《蒙古源流》等14種，「現在纂辦」一項則有《開國方

略》、《日下舊聞考》、《續通典》等13種，³皆是還來不及寫進「全書」、入藏文淵閣的「空函書」。更有若干書籍，是在所謂「告成」之後，才奉旨開始編纂（如：《河源紀略》、《古今儲貳金鑑》等）或欽令寫入「全書」（如：《明宮史》、《明臣奏議》等）的新成員。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新春遊幸圓明園，皇帝都還惦念著藏書閣中猶有若干尚未補完的書籍，落筆自道「四庫云全畧未全」，督飭各館承辦人員加緊趕工、毋任延緩，也提點儒臣務須審慎查核，確保成書品質，「莫頻魚魯混芸編」。由此可見，文淵閣《四庫全書》的「竣工」，無非是為了符應乾隆三十八年（1773）開館修書時便已訂下「十年為限程寬矣」的工作指示，⁴勢必只能如期甚至提前告竣；而在貫徹帝王意志，維護其威信與尊榮的同時，大家仍心照不宣地持續朝向「完工」邁進。

那麼，文淵閣書架上究竟還有多少留空的書函要補？又有多少纂辦未完的「空函書」呢？根據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1787年7月7日）質郡王永瑤（1744-1790）等人奏報奉旨重行校勘文淵、文源（圓明園）二閣《四庫全書》情形所附的清單計算，⁵彼時閣中書架上實存書函、書冊數量應為：經部960函、5,253冊，史部1,387函、8,154冊，子部1,579函、8,990冊，集部1,996函、12,062冊，共計5,922函、34,459冊；各館預留空函（包括撤燬書18函）222函，占全書比例不到百分之五。若再從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五日（1787年11月12日）軍機大臣等奏報文淵、文溯（盛京舊宮）、文津（避暑山莊）三閣還應繼續補入的書籍清單來看，所列「空匣補寫各書」有《（乾隆）御製詩（文集）》、《歷代職官表》等22種，「未經留空現在纂辦及抄錄各書」則有《萬壽盛典》、《平



圖1 宋 戴溪撰《石鼓論語答問》書前提要署記校上時間為「乾隆五十四年二月」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04564~0045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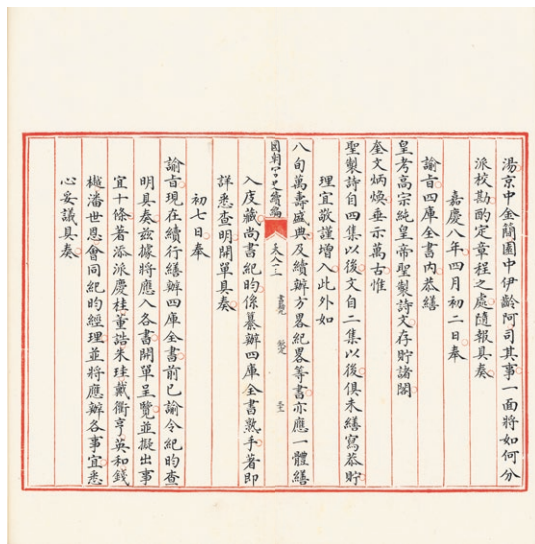


圖2 清 慶柱等編《國朝宮史續編》清嘉慶十一年內府朱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04461~004560

定臺灣紀略》等六種。⁶而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九日（1792年1月2日）紀昀（1724-1805）奏報覆勘文淵閣「全書」完竣，竟還查出許多遺失漏寫的書籍，例如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亡佚已久的《春秋例要》、《熬波圖》，又或者是已經完成纂辦程序，校上時間署記於乾隆五十四年二月的《石鼓論語答問》（圖1），不知為何都沒有寫入「全書」，只好註記「架上未收」，⁷也即時修補善後。

以上僅簡略回顧文淵閣《四庫全書》辦竣後，仍持續進行的纂修、校辦與續補工作，不難發現：儘管所佔「全書」卷冊比例幾乎微不足道，但迄乎弘曆傳位顛琰（1760-1820）、甚至太上皇辭世之前，終究沒有完成全部書籍的續補。換言之，《四庫全書》在乾隆時期並未真正「完工」，實際鈔畢皮藏的數量也還略低於「目標值」三萬六千冊。可以說，《四庫全書》從被宣告「竣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難以被真正認定為一部完整「全」書的歷史命運。

續補「完工」

嘉慶八年四月二日（1803年5月22日），皇帝因思一部分高宗御製詩、文集尚未寫入《四庫全書》，乃命昔日總纂官、禮部尚書紀昀詳查應當續行添補的書籍（圖2），之後又指派軍機大臣慶桂（1737-1816）等七人會同紀昀共同辦理。經眾人調查研議並奏呈聖裁，最終確定必須重新繕校的書籍為：高宗《御製詩五集》、《御製詩餘集》、《御製文三集》、《御製文餘集》以及《欽定八旗通志》共五種。詩、文集正好足以裝進早先預留的集部20個空函，《八旗通志》因係重加輯訂添纂，卷帙數量較原本多出七函，需要騰挪部分書冊位置、改刻前後數十個匣面題名，俱可順利補入。所有書籍繕寫、校閱完畢，呈覽發下後，即請旨交由懋勤殿鈐用御寶，武英殿分色裝潢題簽、依次歸架。嘉慶九年二月初一（1804年3月12日），文淵閣「空函書」終於全數排架完竣，《四庫全書》這才定型為世人所認知「全」書的樣子。⁸



圖3 元 李衍撰 《竹譜》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8179~018183



圖4 清 紀昀等纂 《欽定八旗通志》 清嘉慶八年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4361~01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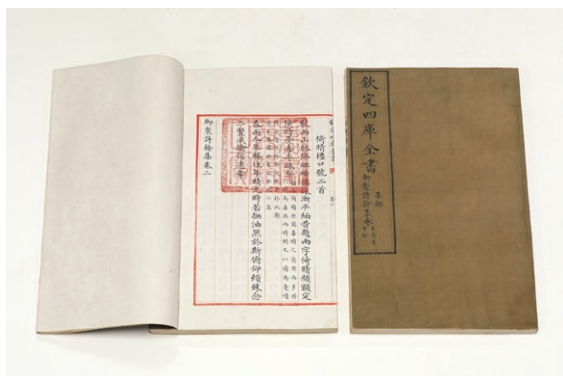


圖5 清 高宗弘曆撰 《御製詩餘集》 清嘉慶八年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31172~031184

正因如此，嘉慶八年繕辦的書冊，和乾隆時期已貯入文淵閣者，形制規格大抵一致，僅局部特徵略有區別。乾隆朝文淵閣《四庫全書》，每冊卷端頁鈐用「文淵閣寶」，⁹末頁用「乾隆御覽之寶」；每冊前副頁有乾隆五十二年諭令重新校閱內廷四閣（文淵、文源、文津、文溯）閣書所黏貼的銜名黃簽，後副頁則是負責該冊謄錄、校對人員名錄。（圖3）嘉慶朝續為添補者，《欽定八旗通志》每冊末頁改用「嘉

慶御覽之寶」（圖4），高宗《御製詩五集》、《餘集》以及《御製文三集》、《餘集》則改用「嘉慶尊親之寶」（圖5）；¹⁰《八旗通志》、《御製詩五集》僅首冊前副頁黏貼「武英殿纂修原任編修臣吳裕德恭校」黃簽，《御製文三集》首冊與《御製文餘集》一冊前副頁則是「武英殿纂修原任編修臣吳裕德恭繕校」，而全部續補書冊後副頁皆不記謄錄、校對人員。

這些埋藏在書頁間或顯或隱的元素特徵，



圖6 清代內府刊印漢文本日講五經四書解義獨缺《詩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反映出他們歷經不同編纂階段所留下的工作痕跡，斑斑可考，也成為院藏文淵閣書中比較特殊的案例。藉此機會附帶一提，數十年前編訂院藏古籍書目時，限於相關史料尚未整理刊布，遂誤將上述嘉慶朝續補閣書一概著錄為「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如今，隨著這些文物線索的揭示，檔案文獻與原書實物得以相互勾稽驗證，當能夠作出更準確的敘述，進而提供觀眾或研究者可資參據的文物資訊。

真正的「空函」

當嘉慶九年仲春，文淵閣書架上原本留空待補的《四庫全書》書函預定要裝盛的若干書籍，皆全部完成繕寫、校改、裝潢、鈐寶、盛函、歸架等程序，各書前後牽動需要重做匣盒、新刻或挖改匣面的幾十個木函，亦悉數配製竣工後，文淵閣《四庫全書》是否就此大功告成，真正成為一部完整的「全」書呢？其實不然。當中唯有一書，屢屢被列入應行纂辦繕寫的名單，卻直到閣書續補畢事、甚至大清帝國傾覆，

都未見其成，造就南、北七閣書架上一處真正無書可補的「空函」。此即康熙年間（1662-1722）欽命纂輯成編、授梓頒行不果，如今僅存序文的《日講詩經解義》；而清代官方出版一系列「日講解義」書籍，乃「經筵」、「日講」制度下的產物。

經筵日講，是中國古代帝王或太子為研讀經史而設置的御前講席，淵源自漢、唐，迄宋始朝向制度化演進，明、清兩代形成一套相關而有別的宮廷教育制度：「經筵」乃每年春（二月至夏至）、秋（八月至冬至）二季展開御前講席的典禮儀式，宛如「始業式」或「開學典禮」；「日講」則是經筵典禮後，春、秋兩段學期間的日常講讀活動。獲選擔任御前講席的講官，多為學問優長的儒臣，講讀內容以四書、五經和《通鑑》系列史籍為主，講題皆奏請欽定，進講講章亦須先行呈覽，歲末再匯錄成帙進呈。¹¹康熙皇帝為彰顯並落實「以經學為治法」（〈日講易經解義序〉）的理念，曾有意將儒臣撰擬的經史講章輯錄成編，鏤版頒行，



圖7 清 紀昀等纂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00001~000017

故先為每一部書寫下序文，也確實在該部經典講完之後，陸續刻印滿、漢文本的《日講四書解義》、《日講書經解義》以及《日講易經解義》，其餘《日講春秋解義》、《日講禮記解義》則要到乾隆年間才完成校訂刊行（圖6），唯獨《日講詩經解義》與《日講通鑑解義》二書，也許曾經初具雛稿，但最終無緣面世。

在清代君臣的心目中，《日講詩經解義》理當是一部必然會編成的經學著作，乾隆皇帝或代擬序文的儒臣甚至誤以為康熙年間「《易》、《書》、《詩》三經先竣」（〈日講禮記解義序〉）。因此，無論是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先行編纂完成的《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嘉慶九年連同補寫書冊、函匣一併改訂的《分架圖》，乃至度藏《四庫全書》的各閣經部書架上，都預留了這部書的編目著錄位置與實體貯存空間。《簡明目錄》將之位列「經部」「詩類」明人朱朝瑛（1605-1670）《讀詩畧記》之後、清朝官私《詩經》撰著之首，僅記書名而無卷數，間隔三行空白留待日後補寫提要（圖7）；隨同文淵閣「全書」繪製陳設的《分架圖》，則是在經部第七

欽定四庫全書			
二通會義經詩	二釋通傳詩	考詩	一輯詩
三通會義經詩	通旁傳詩	考地理詩	二輯詩
四通會義經詩	一通會義經詩	考地名傳詩	說通傳詩
記私詩讀	四全大傳詩	一全大傳詩	緒繼詩
一疏地名詩六	一疏解說詩	二全大傳詩	義演詩
二疏地名詩六	二疏解說詩	三全大傳詩	願解詩
一義古本世經詩	三義古本世經詩	二闕經詩訂重	三疏地名詩六
二義古本世經詩	記詩軒待	一義古本世經詩	四疏地名詩六
三義古本世經詩	記畧詩讀	二義古本世經詩	一闕經詩訂重
二論古詩詩	二學詩問	一學詩問	四學古詩詩讀
所詩	義通經詩	二義新義詩集	一義解經詩讀
記官寫詩	一編古詩詩	一學詩問	二義解經詩讀
義歌賦詩傳詩			

圖8 清 《欽定四庫全書分架圖》 清乾隆間內府圖繪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53214~053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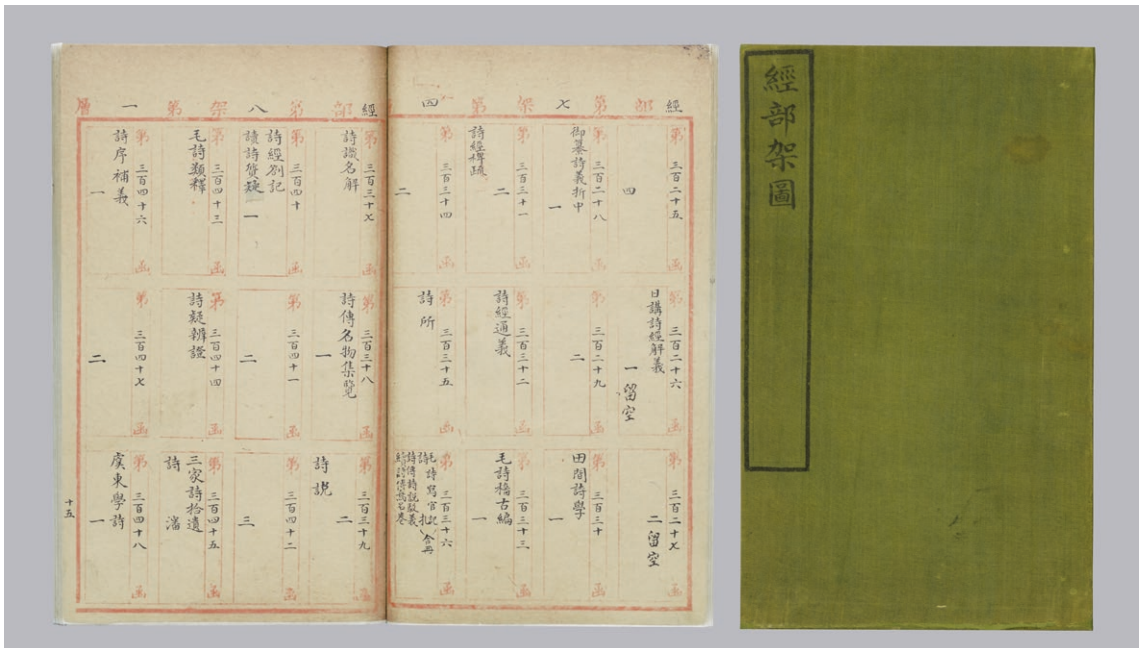


圖9 清《欽定四庫全書分架圖》清乾隆間內府朱格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53205~053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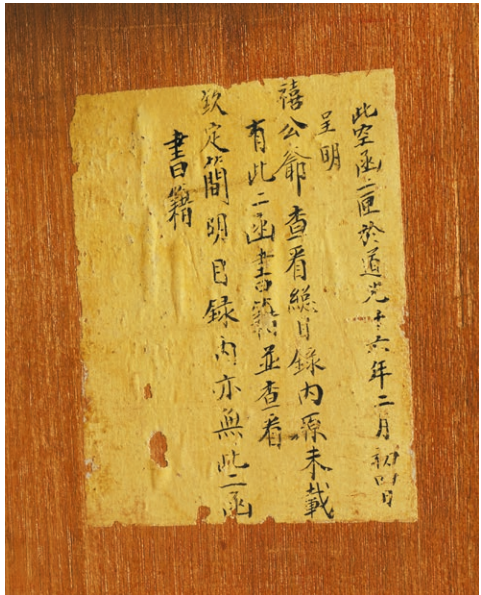


圖10 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第326、327函空函暨內壁黏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架第四層，將《日講詩經解義》二函排置於《欽定詩經傳說彙纂》與《御纂詩義折衷》之間（圖8）；另一部同樣在乾隆年間製作的直式朱格《分架圖》，第326與327函格內皆註記有

「留空」二字。（圖9）只不過，在乾隆六十年（1795）十一月刊刻竣工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或許為求纂輯體例之協調穩當，乃將當時尚未看到成書的《日講詩經解義》先行刪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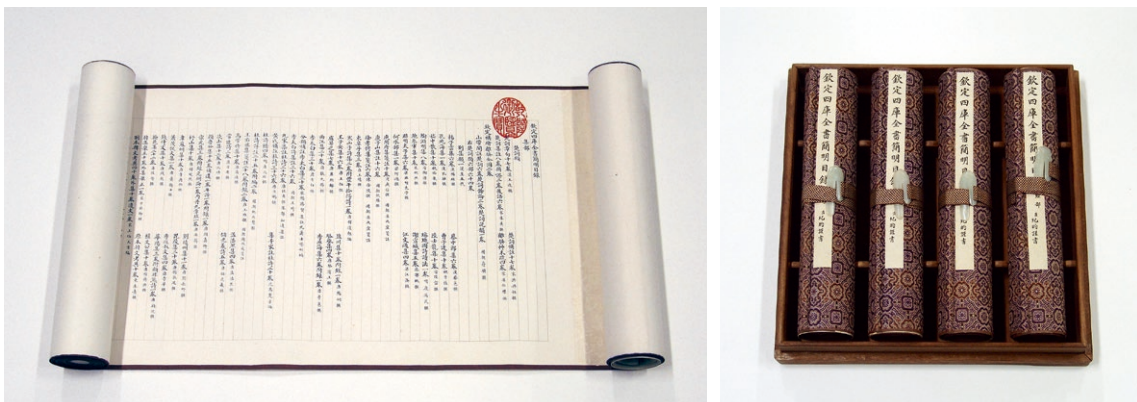


圖12 清 紀昀等編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民國間影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023455~023458



圖11 清 紀昀等編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清乾隆間內府烏絲欄寫袖珍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02202~002221

避免出現「有目無書」或者世人欲「即目求書」卻「求之不得」的尷尬情境。

如今，匣面鐫刻「日講詩經解義」書名的第326、327兩個空函，連同文淵閣《四庫全書》皆為本院典藏。再經啓匣細檢，清楚可見書函內壁各有一張內容相同的黃紙黏籤，記曰：

此空函一匣，於道光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呈明禧公爺，查看總目錄內原未載有此二函書籍，並查看欽定簡明目錄，內亦

無此二函書籍。（圖10）

由此可見，儘管乾隆皇帝考量若每年動用大量人力翻晾文淵閣《四庫全書》，不但容易汗損，收整歸架時又「未能詳整安貯，其弊更甚於蠹」，遂諭令「嗣後止須慎為珍藏，竟可毋庸曝曬」，¹²其後數十乃至百餘年間，內府仍不時對閣中藏書進行點查。匣內黏籤所記，即是道光十六年（1836）文淵閣內供職人員將點查《四庫全書》發現空函情形呈報當時充任文淵閣提舉閣事的宗室禧恩（1784-1852），經檢閱武英殿版《總目》，確認並無此書；至於《簡明目錄》，倘若禧恩查看的是隨「全書」放在經部第一架第一層首函的閣書《簡明目錄》，即如前述，尚可見到《日講詩經解義》書名，只是條目底下空白三行未錄提要，應不致得出「無此二函書籍」這般結論。那麼，掌理閣事兼司啓閉權責的禧恩，取以覆核的《簡明目錄》又會是哪一部呢？

根據院藏咸豐七年（1857）內務府點查編錄的《文淵閣陳設冊》記載，文淵閣中還存放著兩種《簡明目錄》，一為東稍間寶座陳設舊雕漆匣盛四函20冊袖珍寫本（圖11），一為仙樓（中間夾層）東稍間寶座陳設紫檀罩蓋匣盛紀昀手書四卷本（圖12），¹³繕錄書法俱極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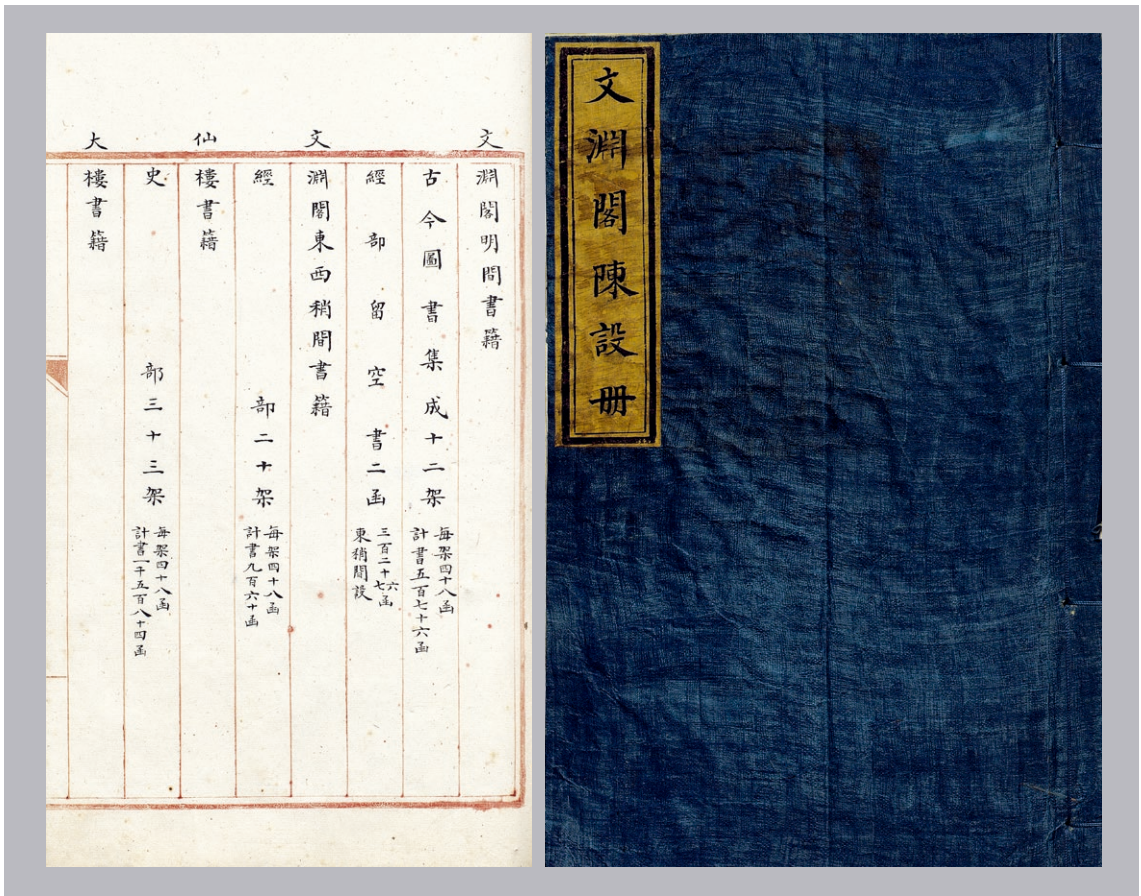


圖13 清 內務府編 《文淵閣陳設冊》 清咸豐七年內府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53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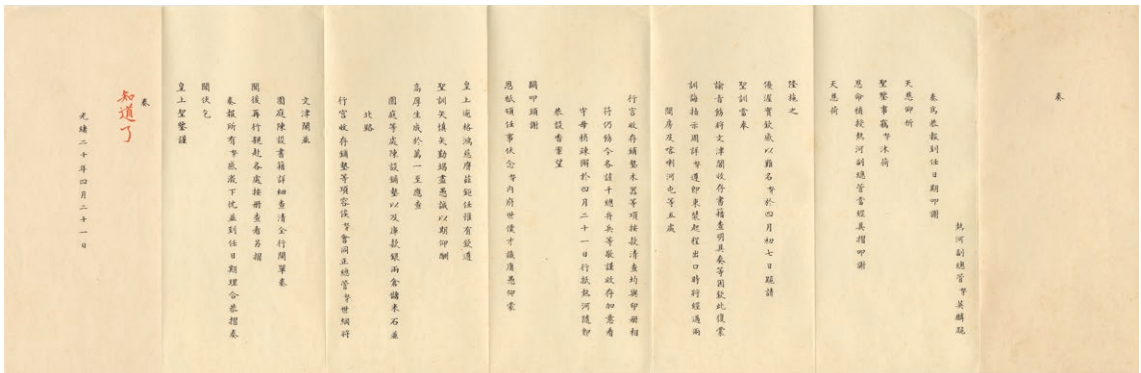


圖14 清 熱河副總管英麟 《奏為恭報到任日期叩謝天恩事》 光緒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 8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144274

整，裝潢也格外典雅；他們都沒有登載《日講詩經解義》，反映閣中實存書籍景況。禧恩或許正是查看了這兩種《簡明目錄》，才能肯定

陳報目中確無此二函書籍。同樣從這份《陳設冊》可以發現，點查人員已經明確注意到閣內陳設書籍的「空函」現象，特別標出在底層明

間東稍間陳設書籍中，有二函實係「經部留空書」。(圖 13) 這些都是文淵閣「全書」專屬或特有的文獻，亦不啻提供若干早期清宮點查文淵閣「全書」的片段史料，或許還難以填補許多歷史的空白，但至少提供後人些許想像彼時宮廷書籍陳設與管理維護的蛛絲馬跡。

當然，總有人們難以想像或者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例如：這兩個留空書函其中之一，又將會在怎樣的機緣下，被裝入何種書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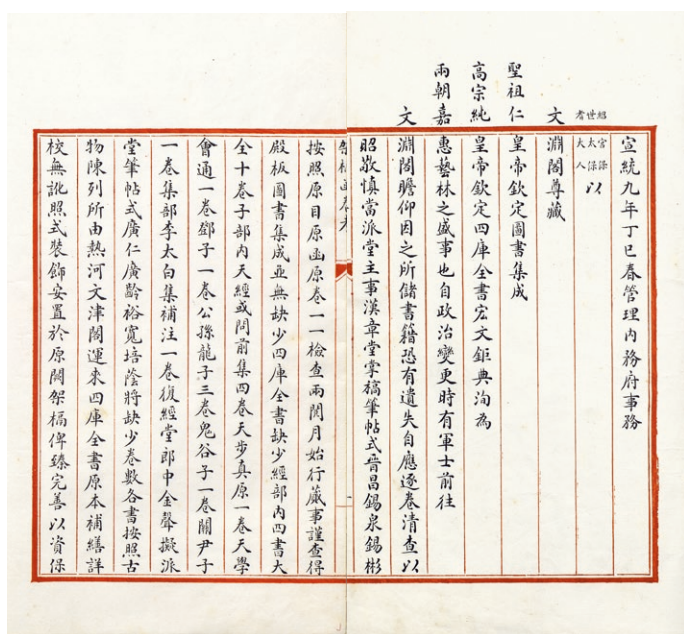


圖 15 清 內務府編《清查四庫全書架榻函卷考》序 清宣統九年內務府朱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53210~053213

盤點與遺失

光緒二十年四月七日（1894年5月11日），熱河副總管英麟（1854-1910）受德宗載湉（1871-1908）召見並面奉諭旨，俟到任後即行詳查文津閣內藏貯以及避暑山莊各殿宇所陳設的書籍。（圖 14）從四月二十一日抵達承德，到五月二十六日備妥清單奏明圖書品目數量，¹⁴英麟會同正總管世綱率領行宮人員，約莫耗用一個月之久，完成包含文津閣《四庫全書》在內共計 4,253 部書籍的清查造冊工作，留下一份詳實簡要的熱河行宮陳設書單，以及堪稱目前可以考見最早且最完整的一次文津閣《四庫全書》點查紀錄。世綱、英麟也特別奏明《日講詩經解義》「有函無書」的情形，經核對閣書首函《簡明目錄》，確認「目下空白三行，徑未填寫撰註，僅註『提要原闕』四字。其為當時並未纂入，並無疑義」。

至於文淵閣尊藏的《四庫全書》，則要遲至民國初期，遜清「小朝廷」內務府做過一次

全面的清查盤點並將結果彙錄成編，世人才得以對於閣中藏書存闕景況，有了比較具體的掌握。「宣統九年」（民國六年，1917）春，管理內務府事務大臣紹英（1861-1925）、世續（1853-1921）以及耆齡（1870-1931）有感於「自政治變更，時有軍士前往文淵閣瞻仰，因之所儲書籍，恐有遺失」（圖 15），遂指派內務府堂主事漢章，掌稿筆帖式晉昌、錫泉、錫彬等人，就閣內 103 座度藏《四庫全書》的楠木書架，每架各榻（一榻即一層。經部、史部每架四榻，子部、集部每架六榻）疊置書函中所盛何書？書有幾卷？分裝幾冊？一一檢查、據實列載，採用與「全書」相同版式的朱絲欄稿紙，端楷謄錄盤點結果；再分經、史、子、集四部，以四色絹面包背裝訂成冊，題名《清查四庫全書架榻函卷考》（圖 16），隨「全書」存放文淵閣中，作為典守人員平時尋檢書籍或日後再度清查的參考研究資料。全部工作，歷時兩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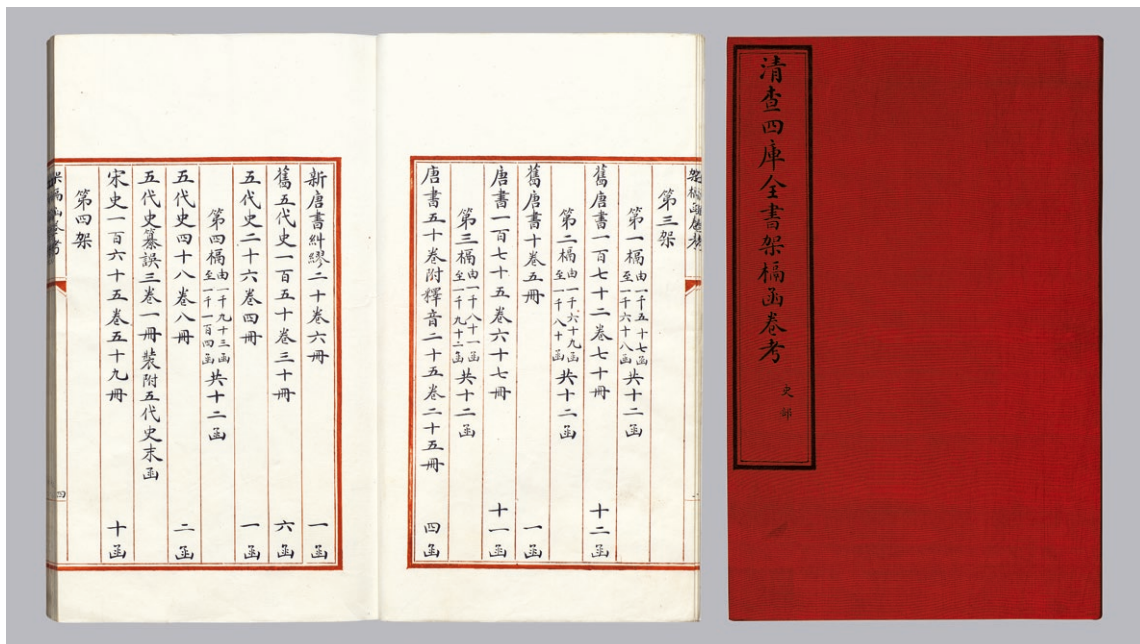


圖16 清 內務府編 《清查四庫全書架榻函卷考》 史部第三架 清宣統九年內務府朱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53210~053213

月完成，而這份紀錄，不僅是研究文淵閣《四庫全書》典藏管理與著錄規模的重要文獻，更可代表「全書」離開文淵閣、紫禁城乃至北京之前，留下最後一次藏書樓與架榻、函匣、書冊完整並存的身影。

藉由這次清查工作，發現閣中「全書」確實有若干書籍遺失，包括：經部第十七架 814 函《四書大全》缺十卷；子部第三架 2733 函缺《鄧子》一卷，第十一架 3298 函缺《公孫龍子》三卷、《鬼谷子》一卷，第廿二架 4100 函缺《關尹子》一卷；第七架 3041 函連同木匣整函未見，內有明末清初天文曆算學者游藝（約 1614-1684）所撰《天經或問前集》，以及薛鳳祚（1600-1680）翻譯波蘭籍耶穌會傳教士穆尼閣（Jan Mikolaj Smogulecki, 1610-1656）之《天步真原》、《天學會通》等三種共六卷；集部第一架 4153 函《李太白集分類補註》缺首冊二卷。¹⁵ 至於經部第七架第四榻上的《日講詩經解

義》，則和《簡明目錄》一樣只記書名而無卷數、冊數，底下直接註明「空二函」。（圖 17）既查明缺書卷冊，內務府堂郎中金聲旋即指筆派帖式廣仁、廣齡、裕寬、培蔭四人擔任補繕的工作。按《架榻函卷考》序文所記，據以補繕文淵閣「全書」的底本，即是當時存放在北洋政府內務部新成立之「古物陳列所」那套由熱河行宮運來的文津閣《四庫全書》。

然而，這卻是一則典型的張冠李戴。早在宣統元年（1909）七月，學部為籌建京師圖書館，大學士張之洞（1837-1909）即奏請撥交文津閣《四庫全書》暨避暑山莊各殿座陳設書籍，俾以「保國粹而惠士林」；¹⁶ 民國三年（1914）元月，文津閣「全書」運抵北京，主管京師圖書館業務的教育部還來不及派人接書，便被內務部「攔胡」送往文華殿交予古物陳列所；翌年八月，內務部始同意將文津閣「全書」移交教育部，轉撥京師圖書館典藏；民國五年（1916）

十一月，文津閣《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與全部書架才正式完成接收入藏程序。¹⁷ 簡言之，「小朝廷」內務府清查補繕文淵閣「全書」的時候，古物陳列所已經先一步將文華殿內的文津閣「全書」點交並移運至當時設置於安定門內方家衚衕遜清國子監南學舊址的京師圖書館，雖然距離紫禁城僅約五公里路程，又如何能即時調取作為補繕文淵閣缺書的底本？

適巧此時紫禁城外廷尚有另一部「全書」，同樣是民國三年自遼寧瀋陽運往北京古物陳列所收存的盛京行宮文溯閣《四庫全書》，被安置在保和殿內，意外造就文淵、文溯、文津三閣「全書」共聚北京城的歷史場景；直到民國十四年（1925）八月，文溯閣書才再度歸返奉天。¹⁸ 正因如此，「小朝廷」內務府人員得以就近前赴保和殿提閱借鈔，成了補繕文淵閣缺書最直接便捷的依據；鈔補校正完成的書冊，同樣裝潢、用寶，再一一歸回文淵閣內原書所在架桶、函匣當中。此外，只需稍加比對這幾種文淵閣「全書」補繕本與文溯閣本、文津閣本書前提要署記之校上年月（圖 18，並參考表一），¹⁹ 便能證明今日故宮



圖17 清 內務府編 《清查四庫全書架桶函卷考》 經部第七架 清宣統九年內務府朱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53210~053213



圖18 周 公孫龍撰 宋 謝希深注 《公孫龍子》 清宣統九年補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8907

表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補繕本與文津、文溯閣本校上時間對照表

作者製表

書名	校上年月	文淵閣補繕本	文津閣本	文溯閣本
《鄧子》		乾隆 47 年 10 月	乾隆 49 年 4 月	乾隆 47 年 10 月
《天經或問前集》		乾隆 47 年 11 月	乾隆 49 年 11 月	乾隆 47 年 11 月
《天步真原》		乾隆 47 年 10 月	乾隆 49 年 8 月	乾隆 47 年 10 月
《天學會通》		乾隆 47 年 9 月	乾隆 49 年 7 月	乾隆 47 年 9 月
《公孫龍子》		乾隆 47 年 9 月	乾隆 49 年閏 3 月	乾隆 47 年 9 月
《鬼谷子》		乾隆 47 年 9 月	乾隆 49 年閏 3 月	乾隆 47 年 9 月
《關尹子》		乾隆 47 年 2 月	乾隆 49 年 8 月	乾隆 47 年 2 月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		乾隆 47 年 9 月	乾隆 49 年 4 月	乾隆 47 年 9 月

典藏文淵閣《四庫全書》，有九種、24 卷、15 冊實為「宣統九年」內務府依據文溯閣書重新補繕的本子；《架橋函卷考》容或是在訊息落差、物事混淆的情況下導致訛傳誤記。藉由這段因緣際會，遂令文淵閣書汲取文溯閣本些許涵養潤澤，重新煥發其為「全」書的神彩。

小結

《四庫全書》堪稱人類歷史上波瀾壯闊也毀譽參半的文化工程，由於特殊的纂修背景，成書之後，學界莫不奉若圭臬，影響既深且遠。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故宮典藏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完整影印出版，為世人開啓一道探索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重要門戶；隨著相關史料文獻陸續發掘整編，推進「四庫學」研究的多方開展，對於乾隆一朝透過清理傳世典籍造成的貢獻抑或斷害，也逐漸形成愈益清晰公允的理解和評騭。時至今日，吾人應能做好心態與知識的準備，誠實而謙慎地面對文物，不僅闡揚其豐厚的內涵，也同時接受他不盡完善的真相。

文淵閣《四庫全書》的「不全」，根源於乾隆皇帝宣示「告成」之際，本就有若干書籍尚未纂辦或繕寫畢事，猶待續補；原訂寫入「全書」者，復因一部《日講詩經解義》未見成書，獨留二個空缺的函匣，南、北七閣皆然。而「全書」遞經時事更迭，終究難免於佚失遺落，遂有民國初期「小朝廷」按照文溯閣本補繕的零星書冊；看似彌縫無闕，實則為文淵閣書注入新的歷史意義與文獻素材，也令人好奇：同為四庫書，在文淵閣本與文溯閣本之間，抑或文溯閣本的乾隆朝原鈔與「宣統九年」補繕本之間，又存在哪些異同趣味？當然，讀者或許質疑：「小朝廷」鈔補的文淵閣書，豈能同樣堪當「國寶」盛名？「天下佳物，原不必以完善而始獲珍祕」，²⁰文淵閣《四庫全書》作為一珍貴文化遺產的整體，基於獨特的流轉傳藏脈絡，內含乾隆原鈔、嘉慶續補與宣統補繕的不同本子，共同建構起這部大書在歷史、文化、學術、文獻乃至文物各方面的多重意義與重要價值，似乎不宜單就鈔寫製作年代輕言去取。

「小朝廷」內務府清查發現文淵閣書遺失並補繕歸架，還不足以為考察「全書」之「不全」畫下句點。筆者將在本文的續篇——〈文淵閣《四庫全書》「不全」說——失而復得、遺珠無憾〉

介紹其中一部遺失書籍離奇的文物生命轉折，也嘗試追索其他書籍如何離開文淵閣？去過哪裡？而今又身在何處？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註釋：

1. 有關文淵閣內部空間格局以及不同樓層存貯《四庫全書》書架的規格、配置、作用等細節，可參考張兆平，〈文淵閣《四庫全書》格架的形制與功能〉，《紫禁城》，2014年S1期，頁24-28。
2. (清)高宗弘曆(1711-1799)撰，《御製詩四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卷87，〈仲春經筵有述〉，頁8b。
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下冊，「軍機大臣奏遵旨查核各館纂辦書籍情形片」，乾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頁1519-1560。
4. (清)高宗弘曆撰，《御製詩四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卷15，〈經書書屋即事〉，頁15a-b。
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冊，「質郡王永瑤等奏現辦覆校文淵文源兩閣書籍事宜摺」，頁2015。
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冊，「軍機大臣等奏遵查文源閣應補各書分繕清單呈覽片」，頁2138-2139。
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冊，「左都御史紀昀奏文淵閣書籍校勘完竣並呈呈列漏清單摺」，頁2150-2155。書名記為「石鼓論語問答」，與《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同；《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與閣書卷端則記為「石鼓論語問答」。
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冊，頁2375-2388，嘉慶年間相關檔案。另可參考呂聲，〈《四庫全書》「空函書」補繕經過〉，《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年3期，頁89-92。
9. 原印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青玉質，交龍紐方形璽，印面12.7公分見方，通高9.5公分，紐高4.9公分，附繫黃色綬帶。實物圖片可在該院網站瀏覽 <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seal/233651.html>。
10. 原印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壽山石質，隨形紐長方形璽，印面長9.7公分、寬9.3公分，通高17.8公分。璽印雕製於乾隆二十年(1755)，細膩精美，原為祝壽之用。實物圖片可在該院網站瀏覽 <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seal/233624.html>。
11. 參考謝貴安，〈明清經筵日講比較研究〉，《長江大學學報》，43卷5期(2020.9)，頁112-119。
1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冊，「諭內閣文淵閣著交提舉閣事一人專管並全書嗣後毋庸曝曬」，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頁2142。
13. 紀昀手錄原件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本院藏有二種民國初期影印本，可據以檢核所載書目。參考劉美玲，〈書裝得體：由院藏《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之裝幀談起〉，《故宮文物月刊》，384期(2015.3)，頁32-43。
1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附錄一〉，下冊，「熱河總管世綱等奏查明文津閣並園內各殿宇書籍摺」，光緒二十年五月二十六日，頁2391-2674。奏摺暨清單原件現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檔號：04-01-38-0028-001、04-01-38-0029-058；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另藏有一冊傳鈔本，可線上瀏覽全文影像 [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3688740\\$1i](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3688740$1i)。
15. 《清查四庫全書架榻函卷考》序云缺1卷，不確。
16. (清)張之洞，〈為籌建京師圖書館等由〉，宣統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機190582。
17. 參考李致忠，〈魯迅與京師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學刊》，2009年1期，頁13-14。
18. 參考奉天圖書館編，《文淵閣四庫全書要略及索引》(奉天：奉天圖書館，1931)，頁8。
19. 文津閣本校上年月，依據《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文溯閣本校上年月，依據《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
20. (宋)林通(967-1028)撰，《重編西湖林和靖先生詩集》(明正統間王圻校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黃丕烈(1763-1825)跋。